

# 论吐蕃时期佛教从宫廷到民间的转向

马俊红

(西藏民族学院政法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 吐蕃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的转向过程。文章从转向前佛教在贵族中受到的礼遇和挫折写起,叙述了这一时期佛教在民间的发展情况以及吐蕃政权瓦解后佛教在民间的兴盛。

**关键词** 佛教;宫廷;民间;转向;兴盛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6(2006)05-0029-04

佛教传入西藏至今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初传之时,它的主力一直在吐蕃王室活动,跟随王室权力斗争的起伏而曲折发展,历经沧桑之后,终于在民间找到突破口从而在青藏高原站稳脚跟。这个曲折坎坷的流传过程,就是佛教从宫廷到平民的转向过程。

## 一、佛教在吐蕃宫廷的发展

多数藏学家认为,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始于松赞干布时期。为了巩固政权,发展藏族文化,统一思想,他聪明地利用了随两位公主输入的佛教,修建了大小昭寺及其他道场,供奉佛像,翻译佛经。弘扬佛法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从松赞干布到赤松德赞的一百多年间,土著宗教苯教势力强大,而佛教发展相对缓慢。赤松德赞成年亲政后,铲除了反佛势力,采取兴佛措施。他邀请著名佛学大师静命(寂护)和密咒大师莲花生入吐蕃,并亲自主持了佛苯之间的辩论。此后,佛教势力在赞普支持下,兴建桑耶寺,发展吐蕃僧团。僧团由部分王妃、大臣夫人、贵族子弟组成。“皇后没卢氏一自虔诚,划然开悟,剃除绀发,披挂缁衣……善能方便,化诱生灵,常为赞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诸大臣夫人卅余人说大乘法,皆一时出家矣……又有僧苏毗王嗣子须加提,节操精修,戒珠明朗,身披百

[收稿日期] 2006-04-10

[作者简介] 马俊红(1978-),女,河南省鹤壁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政法学院 2004 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

纳,心契三空……”<sup>[1](P19)</sup>在一些藏文史书中,也记载了这个时期三百多藏人受戒出家的情况。可以推测,这时候出家的人大多为贵族身份。

王室对佛教的重视在赤祖德赞热巴巾时发展到极至。热巴巾极度崇佛,对佛僧的侍奉远远超过其前任何一位赞普。他不仅将吐蕃内外的著名学者组织起来翻译新的佛典,还建了数十座修行院、讲经院和戒律院,甚至实行“七户养僧制”,供养僧人,制订苛刻的法律,要求臣民绝对尊重僧人,否则给以重罚,以强迫手段提高僧人的地位,致使此时的僧侣实如贵族阶级。他们与世俗贵族一样拥有属民和特权,但其地位又在世俗贵族之上。

赞普的宠信对于佛教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最终导致君臣矛盾、僧臣矛盾、僧民矛盾、佛苯矛盾的尖锐复杂并日益激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朗达玛禁佛事件。“此王心中魔障,捣毁神殿,毁灭佛法。僧侣之生命亦遭杀害。一切修习佛法者均被杀害或摧残。所有一切经卷焚之于火,喇嘛阿闍黎被奴役为奴,令高僧大德与佛法相隔绝。指派诸僧侣为屠夫。将佛像的衣服投入河内。用石头砸毁三所依之供器,佛法之名亦使其不存。”<sup>[2](P33)</sup>这样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但说明了此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严重打击。此事件持续了大约四年,时间并不长,却使佛教在吐蕃几乎百年不传。

从踏上吐蕃的土地到朗达玛禁佛,佛教始终扮

演着统治者的工具的角色。王公贵族的宠信和支持把佛教人为地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其制造浩大声势。此时的佛教的确在上层焕发出盎然生机。信奉佛教的主体在王室,佛教的观念和行为发生在赞普、王妃、大臣之中。他们利用佛教统一思想,加强统治;所有传法的僧人也都是针对王室而来,争取他们的信任、信仰、支持、供养。当时,只有这些人才是佛教活动的支持者、组织者、参与者。由于佛教和统治阶层之间存在着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王室内部发生权力争斗时,佛教不可避免地成为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完全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力和回旋余地。朗达玛禁佛,停止了对寺院的供养,僧徒就四散而逃。这个事实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佛教在吐蕃没有独立的物质基础,没有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没有稳固的信仰团体,也没有真正站稳脚跟。

## 二、佛教从宫廷转向民间

从历史上看,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对整个社会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赞普本人并非佛教信仰者,其做出热情于佛教的姿势,最主要是为他的政权考虑,也许还有讨取两位公主以及尼泊尔和大唐欢心的因素在内。当时吐蕃初建,内政外交一片繁忙,他即使想认真地扶持佛教恐怕也没有足够的条件。但是因此认为佛教在民间就没有一点儿影响,也是不合理的。众所周知,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即制定了“基础三十六制”,其中三十八条“王朝准则”中有21条是与佛教教理相吻合的。这21条中,有的内容直接可以在佛教的教理中找到,如不杀生法、断偷盗法、禁止邪淫法、禁止说谎法、禁止饮酒法与佛教的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说谎、戒酒一一对应;有的是其内容的延伸或解释,如在家道德规范法十六条的一些内容;即使在对官员的贬褒规定中,也包含了佛教的内容。在这21条中,我们还可看到诸如三所依、三宝、十善、寺院规范师、座前法师、密咒师等佛教用语。而且从史书中我们了解到,此时的吐蕃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样的良好局面和当局所制定的法律制度不无关系。因此可以认为,尽管佛教和下层民众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但实际上佛教对社会的影响是存在的。由于消息闭塞,文化落后,民间百姓可能不知道其遵守的法律中有佛教的内容,统治者没有有意在民间推广佛教,佛教僧人也没有在民间开展任何宗教活动,但是佛教的一部分教理随法律走向民间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此时的接触是间接的,但并不影响我们将此视为佛教在吐蕃走向民间的萌芽。

此后的历代赞普期间,佛教的发展时急时缓,为了和上文的叙述保持一致,这里仍以赤松德赞和热巴巾时期佛教的发展为例来讨论吐蕃时期佛教在民间的情况。

赤松德赞和热巴巾时期的几位赞普对佛教持支持的态度,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成效。赤松德赞的“三户养僧制”、牟尼赞普的“三均贫富”、热巴巾的“七户养僧制”使庶民和僧人发生直接联系,把庶民推向佛教,直接为佛教服务,甚至把日常的生活和佛教连接起来。庶民在和寺院僧人的交往过程中对佛教有所了解,为后来佛教大规模地转向民间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藏传佛教具有重视密法的传统,这与莲花生及土著苯教有关。在佛教输入吐蕃之前,苯教是当时社会唯一的宗教形式。它以神灵和咒术支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左右着各个部落,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正是这股势力启发了初来吐蕃的莲花生。他意识到佛教在本地面临的严峻形势,于是灵活地对佛教作出了调整。他受请到达吐蕃后,一路遇妖降妖,逢魔伏魔,并使之皈依佛教,许多佛教史书中记载了这些事情。从这些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所经之处,苯教徒变成了佛教徒。从西藏现在的版图上看,莲花生从南线进入吐蕃,经现日喀则,到拉萨和山南地区。据说,沿途百姓为其高超的法术吸引,而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根据实际,他把藏族族人熟悉的苯教神祇、仪式甚至赞普的形象纳入了佛教中。可见,佛教在传入吐蕃的过程中,对本土传统文化做了针对性的选择,对佛教做了相应的调整。尽管做此调整是为了与苯教争夺贵族势力,但是也因此而使下层民众对佛教有所认知,并以此为开端,吐蕃的佛教有了密法的成分。在莲花生之后,修习密法的教徒渐多,大部分修密僧人不是呆在寺院中,而是在民间活动,与下层民众零距离接触。

在吐蕃统治阶层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以后,莲花生为南喀宁布、毗卢遮那等二十五位有密乘根器的人讲三瑜伽法。当时,密宗在吐蕃没有地位,上述二人处于尴尬境地。苯教徒因其为佛教徒而加以排挤,显教徒视其为另类而不予以承认。赤松德赞被迫将他们流放到边区。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中断佛教活动。毗卢遮那被流放到康区察哇咙(在原西康宁静,今四川阿坝一带),他在那里翻译佛经、隐居修炼、建寺收徒。后人以此为佛教在该地区的初传播时期。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毗卢遮那是点燃佛教明灯的圣人。至今,该地的城市、村落、大山、岩洞仍保留有他的神迹,还有以他的尊号命名的地名、山名、寺名。朗达玛灭佛期间,就有僧人逃到这

里。由此可见,他在康区的佛教活动对当地造成的巨大影响,也说明他在这里营造了有利于佛教发展的良好氛围。晚年,他又到西部嘉地方的玛迦洞长期修行直到去世,据说,还修建了查果坚佛殿。毗卢遮那的一生几乎都和佛教有关,从他的生平中,我们既可以推测当时佛教在吐蕃的整体情况,也可以对佛教在民间的发展有所了解。

约略此时,佛教显宗内部不和,来自印度的持渐修见的大乘者与来自汉族的持顿悟见的禅宗师由于不同的见解而产生矛盾。摩诃衍那是禅宗在吐蕃的代言人,他和同到吐蕃的其他汉族和尚大力宣扬其快速成佛法。他们不呆在寺院里念诵经书、翻译经典,而是分散开来深入民间宣传他们的理论。下层民众文化水平低(或者没有文化),抽象思维能力差,难以理解佛教高深的理论,他们空闲时间少,难以系统地研究佛法;他们长久以来和苯教打交道,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接受佛教繁琐的仪式,所以对他们而言,成佛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是禅宗毫不费事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禅宗宣扬“无思”、“无念”、“顿悟成佛”的理念,坚持“睡即成佛”的方法。该方法不需要太多的供养,无须艰苦修行和漫长时间,“顿悟成佛”,即身成佛,对于修佛的人特别对下层民众是极大的诱惑。不仅已经出家的一些佛教徒汇集在他的身边,那些新的信仰者也追随他而出家,在民间掀起信仰禅宗的小高潮。尽管后来汉僧被赞普逐出吐蕃,但禅宗的影响在民间并没有消失,在贡巴饶赛到达丹底(在西宁塔尔寺东南,循化以北黄河岸上)传法时,此地还有修习禅宗的僧人。

佛教徒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上层而忽视了民间,但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以各自的方式在民间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在民间的发展。尽管势头微弱,但却为后弘期佛教转向民间并在吐蕃复兴准备了现实条件。朗达玛灭佛时,大批的僧人逃亡民间,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民间已经有足够的条件接受佛教,否则,他们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建起新的佛教活动中心。

一些史学家认为,此佛教在民间的基础薄弱,是有道理的。因为此时佛教的主流在宫廷内活动,到民间弘法的僧人毕竟是少数。与佛教在王室的跌宕起伏相比,民间佛教的发展则是平坦的、宁静的,统治者崇佛主要是为了与异己势力争夺实权,似乎还没有产生利用佛教统治民众、将佛教推及民间的意识,对佛教在民间的发展极不关注。但是,佛教在民间不是一穷二白,而是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的,尽管比较薄弱,但总是有了民间的信仰者。而且他们要比王室的信仰者坚定和稳固得多。

如果可以将佛教在民间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的话,此即为初传阶段。佛教大规模进驻民间发生在朗达玛禁佛之后。

### 三、佛教在民间的兴盛

朗达玛身亡之后,吐蕃政权瓦解,地方政权林立,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动荡的社会形势对于佛教却是复苏的良机。

自毗卢遮那以后,佛教在康区的传播几乎没有中断过,始终重视密法实修,讲究戒律。这种风气影响到附近的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佛教保留了纯正的佛教传统。所以,朗达玛禁佛时,大批僧人选择这里建立佛教中心,点燃佛教复兴的火焰。

佛教在卫藏的发展遭到抑制以后,佛教徒四处逃散,或者还俗不敢公开信仰佛法,或者逃到距离拉萨比较远的边地继续传法。总之,当时在卫藏地区没有了统一的佛教组织和传法运动。据史书记载,朗达玛禁佛期间,原本在曲沃日地方修行的藏·饶赛、约·格迥、玛·释迦牟尼三名僧人就携带律、论等佛典逃到安多藏区,继续修行传法。他们延续了由寂护、莲花生等传入吐蕃的正统佛教,使一度被中断的戒律传承得以延续,贡巴饶赛即从他们出家。此人通达佛教教义,出家后被邀请到丹底,受到当地藏族上层的信任和支持,建造寺塔,宣传佛教思想,在当地甚至在卫藏造成很大影响。此时,卫藏地区一些所谓的僧人或者是不僧不俗的带发修行者不守戒律,或者披着佛教的外衣做着苯教的事情,苯教徒则极为活跃。鉴于宗教界的混乱局面,统治者就派鲁梅等十人师从贡巴饶赛学习佛法。这些人学成之后,除了热希粗墀迥乃留在康区传法,其余9人先后在卫藏地区广收门徒,宣扬戒律,并带领各自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建塔寺(据说有二百余座)。这样,他们把佛教从丹底带回到藏区的同时,也在民间留下了佛法,吸引更多的人出家,扩大了佛教的队伍,壮大其规模。

约在此时,有名为念智称(弥底)的印度僧人流落民间,后来到西康、李曲色喀一带译经传法,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讲授佛学的小小的中心。

在多康地区活动的这些僧人,尊重佛教的本来面目,遵守佛教的戒律,按照佛教的原始意义宣传佛教,促使多康地区的佛教健康而蓬勃地发展。

此时,吐蕃本土大部分地区的佛教都处在发展中,但其与传统佛教相比出入很大。在阿里地区,佛教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佛教徒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深入民众,突出地表现在密法上。

由于热巴巾时期禁止修密,密法便在个人家里以父子、叔侄口传的方式承继下来。由于比较隐秘,



在朗达玛禁佛时才没有遭到迫害,但受时代影响而掺杂了不少当时流行的一些苯教的东西。佛教僧人与巫师、咒师合为一体。他们没有统一的教义,摆脱了戒律约束,不受团体控制,在社会上各自分散自由活动,民间称他们为“游方喇嘛”。这些喇嘛一方面过着悠然自得的世俗家庭生活,一方面也不忽视在民间的宗教修持。他们不诵读佛书,不研习经典,不重视佛理,不讲究修行次第,依靠法术、咒术以个体的名义在民间展开活动,吸引了不少的民间信徒,为佛教扎根于民间提供了条件。这些佛教徒的行为已经偏离了正宗的佛教,容易使人们曲解佛教的真面目,长此以往必然损害佛教的正常发展,甚至将佛教引入歧途。阿里佛教中心的地位也难以保持。阿里政权自吐蕃王朝分裂后就掌握在朗达玛之子沃松后裔手中,并建古格王朝。这一系沿袭其先祖的做法崇信佛法,并有成员出家,支持佛教与一般民众之间的联系。日渐脱离正统佛教的现象使得统治者忧心忡忡,于是,便派仁钦桑布等21人到克什米尔留学,希望他们学习正统佛法。仁钦桑布不辱使命,学成归来,一方面译经传法,另一方面处处建立僧伽组织,以严格的佛教戒律要求他的弟子们,奠定了戒律传承的基础。

仁钦桑布的又一贡献就是协助古格王朝请了不少的印度高僧到阿里,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底峡大师。大师了解到阿里佛教界的实际情况后,即着手整理现状。首先,他把密法提升到佛学理论的高度,从教义上支持仁钦桑布的佛教活动。他强调学法的基础是戒律,主张戒、定、慧三学并重,修行循序渐进,先显后密。其次,他采取综合而有次序的方法指导弟子学法修行。在他的努力下,佛教逐渐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在民间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信仰佛

教的民间信徒日益增多。阿底峡为佛教在西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促成其与民间的更加紧密的结合。由此,密宗也逐渐改变了原来重修行轻理论、注重世俗生活而不守戒律的现象,再次以纯正密宗的面目出现于社会,在民间引起极大反响。

外出留学寻求正统佛法的浪潮自民间兴起。此时的留学大多不纯粹依靠王室的提倡、赞助。他们根据个人的需要自己组织,自备黄金,自主选择要去的地方和所从的老师。从他们中间诞生了不少著名的译师。原有的一些译师也外出留学。他们除了在那些国家学习和修行,还在回来的时候邀请了不少的高僧协助翻译。因此,这个时候佛典的翻译工作在民间紧锣密鼓地进行。所译内容几乎全凭译师个人兴趣爱好自由选择。总体而言,此时译经的重点放在金刚乘密法典籍,一大批这种典籍被翻译出来,供教徒们使用,为密宗的纯正提供了思想保证。留学和译经在民间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佛教在民间的兴盛。

至此,佛教几乎完全替代了苯教在民间的位置,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为藏传佛教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 [参考文献]

- [1]王锡著,饶宗颐序说、校记.顿悟大乘政理决[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2]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审稿 索南才让]

[校对 梁成秀]

## On the Land-Hoarding System Practiced in Big and Small Jinchuan Area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Peng Zhi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After suppressing the big and small chieftain war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in the Qing dynasty, Qianlong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land measures, among them are various land-hoarding systems in economy. It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Qing government's reign over the Jiarong Tibetan area, in the country's reunification, and in the stability of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Key Words:** Emperor Qianlong; big and small Jinchuan; land-hoarding system

## On the Transforming of the Buddhism from the Court to Folks during the Tubo Period

Ma Junh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ubo period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court to folks. From the courtesy and setbacks received by Buddhism among aristocracy before the transforming,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folks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flourishing of Buddhism among folk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Tubo regime.

**Key Words:** Buddhism; court; folks; transform; flourish

## The Proces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Running Schools in Tibe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Ding Linghui

(Dept.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act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run primary schools in Tibet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termined plans for Tibetan education, codified and translate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llocated fund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Lhasa Primary School"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n because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instigated the pro-British forces to create "Han-expulsion incident", "National Lhasa Primary School" closed.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national government; run school; "National Lhasa Primary School"